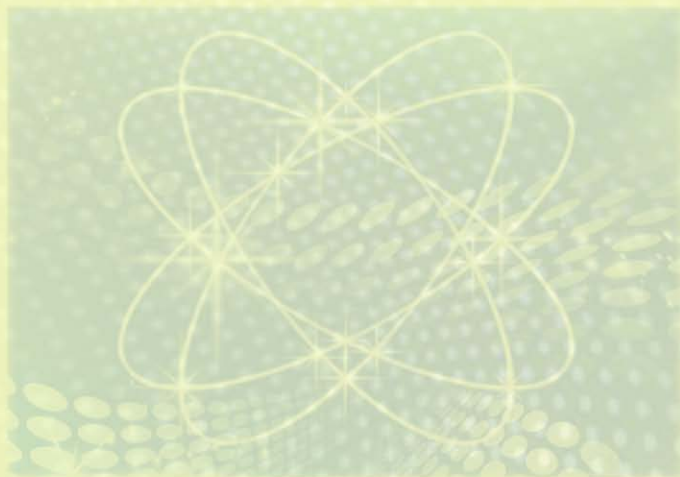


文化建设与传播安全

高红玲 主编



新华出版社

文化建设与传播安全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

北京汉风唐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校次： 时间：

排版人员： 核对人员：

责任编辑： 联系电话：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建设与传播安全 / 高红玲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166-0396-3

I. ①文… II. ①高… III. ①文化事业—建设—文集 ②传播学—文集

IV. ①G11-53 ②G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5032号

文化建设与传播安全

主 编: 高红玲

副 主 编: 李蓬勃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沈文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北京鑫海胜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3.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396-3

定 价: 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CONTENTS

突发事件信息公开问题浅析 魏 伟	1
一、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群体症状与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2
二、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所存在的问题	3
三、加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	5
四、结语	7
内忧外患中近代中国佛教的新变革 刘晓英	8
一、救亡图存的强烈爱国情结	9
二、爱民、新民的忧患之思	13
三、护教兴学，振兴中国文化	14
试论高校文史教育与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 高玉昆	18
一、文史知识在当今国家安全和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19
二、文史知识在当今国家安全和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缺失	24
三、大力加强高校“国”字头专业方向的文史教育	26
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国际关系的视角 王晓晖	31
一、现代恐怖主义的缘起	32
二、恐怖主义的手段和目的	34



三、恐怖主义的新工具——大众传媒	38
四、大众传媒——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战略资源	41
中国文化复兴的转机与危机漫谈 郭小聪	44
上篇：中国文化复兴与社会理想转向	44
下篇：社会理想转向与中国文化危机	50
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分析	
——以“艾滋女事件”为例 吴 茜	54
一、事件回顾	54
二、“艾滋女事件”中网络媒体的报道情况	56
三、“艾滋女事件”中网络“把关人”的分析	57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谣言传播及其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董 璐	70
一、谣言的传播机制：选择性的过程	71
二、谣言传播的社会实质：集合行为	74
三、谣言传播的心理动因：害怕孤立	77
四、谣言的传播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81
五、结语：对策浅探和信息素养的提升	85
当代大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王慧玉	89
一、国内跨文化交流	90
二、国际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93
三、结论	101
主旋律电影与国家文化安全 张中全	104
一、国家文化安全与中国电影误区	104
二、当前主旋律电影的困境	106
三、主旋律电影与国家文化安全	108
四、结 语	113

从孔子像的立与迁看当今中国文化心态 李蓬勃课题组.....	114
一、概述	114
二、孔子像事件态度分析	116
三、孔子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地位	121
四、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分析	128
从“媒体审判”看中国转型期的舆论安全 张中全课题组.....	135
一、前言	135
二、中国“媒体审判”现状	137
三、世界各国“媒体审判”情况.....	142
四、社会转型期间理性应对“媒体审判”	145
转型时期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与类型	
——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 高红玲课题组	148
一、共性：群体性事件的定义	149
二、个性：四类典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51
三、余论：注重群体性事件的研判与应对	158
群体性事件的博弈特征与结果	
——基于“6·17”湖北石首事件的案例分析 高红玲课题组.....	16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160
二、群体性事件中利益博弈的常规化与参与者的多元化	162
三、群体性事件中博弈失败引发负面情绪的积累	166
四、群体性事件中合作博弈的演变	169
五、群体性事件的博弈结果与趋势	172
论文化安全中的弱势文物保护问题	
——以山西太原为例 董璐课题组	176
一、问题的提出	176
二、弱势文物保护对文化安全的意义	177



4 文化建设与传播安全

三、弱势文物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以山西太原为例	180
四、我国弱势文物保护对策的思考——参考日本、法国、意大利 ..	190
五、结论	195
2012全球大选年的文化思考 刘俊阳.....	196
一、2012全球大选年	196
二、美国选举的历史文化背景	198
三、2012年美国大选	203

突发事件信息公开问题浅析

魏 伟

内容摘要：在突发事件频发的今天，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加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是解决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诸多问题的重要举措，其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源作用，实现新旧媒体的优势互补，引导舆论走向以及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优质、高效地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突发事件 政府 信息传播 信息公开

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的改革、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在不断增加，突发性公共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如“非典”、禽流感、汶川地震、“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等。政府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应对和正确处理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会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处理得当，政府形象大大提升，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反之则会影社会长治久安，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

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是考查政府行为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建立有效的应对危机机制，尤其是对信息的公开和疏导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态把控和损失减免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一、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群体症状与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以及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即事件爆发前兆或预兆较少，让人毫无防备，一般具有较强危险性和破坏性，影响范围广，通常会成为社会的焦点而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当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受到事件的震撼和冲击，会产生社会学家所称的群体异常反应，闫爱华（2005）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说明，主要表现为：

第一，群体恐慌。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生活遭到人为或自然力量突如其来的破坏，造成社会公共危机，随之导致人心浮动，惊恐、猜测和忧虑成为主要的社会情绪。面对危机，群众往往会惊慌失措，做出非常之举，它反映的是群体对未来的恐怖预期和不确定性判断。

第二，谣言四起。政府管理部门出于稳定民心，避免引起社会更大的骚乱等方面的考虑，因此控制信息发布的正式渠道，封锁消息，致使大众传播渠道不畅或信息匮乏。人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但又迫切想了解事实真相，这时容易导致谣言四起，多数群众会在此时表现出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传言便成了人们急需获悉真实信息的代用品。

第三，公信丧失。政府舆论控制下的媒体报道由于过于谨慎甚至集体“失语”，导致各种传言先入为主，长此以往，群众对原本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和媒体产生不信任感，并且此后会倾向于从非主流媒体那里获取信息。

第四，人人自危。心理学家马斯洛在需要层次理论中把对安全的需要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需要。当人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且又不明事件真相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举止异常，甚至以邻为壑，连正常的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渐深入，媒介社会的方兴未艾，政府传播活动日益成为国家的延伸。政府是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主体，因此有责任和义务向公众及时传递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保护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对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进行失真报道，甚至隐瞒封锁，将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会阻碍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2003年“非典”爆发的初始阶段，由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集体沉默，导致危机初期应对时间的延误和效率低下，其后果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国的政府形象和国际形象也受到极大的损害。“5·12汶川地震”中，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向广大民众提供了真实、权威的灾情信息，人们不再惶恐，面对灾难，展现出坚韧与顽强，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一致抗灾。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开放的形象，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因此，突发事件信息的公开会直接影响事件处理的好坏，不仅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更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所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管理方面却相对滞后，尤其在当今突发事件的频发时期，政府在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1. 信息瞒报、漏报，丢失“第一时间”原则

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及时、准确、真实地公开事件信息，否则会引发危机事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一些政府官员在导火索事件发生后，担心发布信息会影响政府形象，引发社会恐慌，因此不是积极应对，将事实告知公众，寻求解决办法，而是消极对待，采取瞒报、漏报、谎报或迟报事件的措施。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现首例“非典”病例，在爆发初期几个月的时间里，政府隐瞒疫情，导致病毒扩散，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也给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象等方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2008年的“瓮安事件”，相关政府部门搞官僚作风，漠视人权，封锁消息，不及时公

布权威消息，使得各种猜测充斥互联网，谣言漫天飞，又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由最初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最终发展演变为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给当地的稳定发展大局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2. 信息传播畸形变异，引发舆论危机

“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变异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早已有之的社会现象，也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①欧三任将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演变的变异形式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演化成威胁公共安全的恐慌性信息，如2010年一条“四川广元的橘子长了小蛆虫”的短信引起了柑橘市场的轩然大波；第二，变异为经济获利性信息，如地震后九天内公安机关就侦破通过虚设援助机构或虚构信息以诈骗他人钱物的10起诈骗类案件；第三，转化为不信任政府的政治谣言，如在拉萨的“3·14打砸抢烧”突发事件中，外国媒体就曾一度制造歪曲事实真相、诋毁中国政府的政治谣言；第四，突变为与迷信相结合的异化体，如“非典”疫情后，一则“男婴一出生就开口说话，说：‘这场非典是上天要收人的灾难，而他是下界来拯救万民的，只要人们熬绿豆汤即可免灾’”的迷信信息4天就传播到了14个省等。

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畸形变异一方面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特点所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真实信息没有得到及时澄清和引导，因而导致谣言大肆传播，突发事件变质、恶化。

3. 政府与媒体缺乏良性互动，信息公开渠道不畅

媒体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它既受政府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既引导公众，又需要满足公众需求。媒体一方面代表公众时刻关注、监视危机处理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其声音和指

^① 欧三任：《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的变异与防控》，《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6页。

示”。^①

由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缺乏保障信息公开的法律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相关发言人对一些关键信息含糊其辞，以“涉及保密”“公共利益”等为由隐瞒信息，使得信息公开不透明。因此，如果政府与媒体缺乏良性互动，将不利于信息高效传播，影响突发事件的处理进程。

三、加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

1. 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源作用，及时、准确、真实地公开信息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3T原则，即Tell your own（主动提供信息）、Tell it all（提供全部信息）以及Tell it fast（尽快提供信息），强调危机处理时主动、及时、真实发布信息的重要性。政府充分发挥其信源角色，对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突发重大危机后，公众迫切需要了解事件各方面的情况，以舒缓不安和紧张情绪，从而更好更快地接受和理解政府的危机处理立场和对策。政府和主流媒体应在第一时间发布已查明的事实，使正在或即将采取的措施先入为主，抢占舆论主渠道，将各种传言消灭于无形。然后随危机处理的进展发布阶段性消息，稳定人心确保正常秩序的维持。

2. 实现新旧媒体的优势互补，引导舆论走向

当今是信息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多样，除了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更有新技术支撑体系下的新媒体，如“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传播方式的异军突起。政府在推进建设稳定、安全而正常的媒介社会中负有必要而又必然的责任，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自的优势，加强

^① 闫爱华：《危机处理中的政府公共》，《山东视听》，2005年第12期，第13页。

两者在竞争中的并存互补，使其共同致力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加速突发事件的解决。如传统媒体可以在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通过与新媒体的联合，形成更强大的传播规模，从而满足群众的多样性心理需要。在新闻报道中注重平民视角，讲究评论技巧，采用受众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产生显著的舆论引导效果。

3. 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政府新闻发言制度是现代民主政府进行公共信息发布、传播和服务的基本形式，也是以政府新闻发言人和政府新闻发布会为主要标志的政府传播主渠道。”^①近年来，虽然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信息不透明。政府新闻发言人应该发布哪些内容，不应该发布哪些内容不明确，程序不规范。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对于保障信息公开的法律空缺，但规定保密制度的法律则显得十分严格，这使得政府新闻发言人会害怕泄密被追究责任而趋于保守，不敢轻易透露事实信息，结果会导致虚报、瞒报，进一步影响政府公信力。此外，某些地方政府将新闻发布制度只当成政绩展示的平台，只进行正面宣传，对一些阴暗面，敏感的话题实行控制，唯恐引起“负面效应”。一系列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事件一再发生，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正面临危机。因此大胆借鉴西方国家有关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确保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逐步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为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法律上的支撑和保证。

第二，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新闻发布会是有组织的人际传播，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提问所表现出来的机敏的反应，得体、礼貌的表述以及亲和、权威的形象都将直接影响信息的传播效果。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官方新闻发布会终于在温州举行。王勇平作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回答媒体记者和公众关于此次事故

^① 许月，高波：《政府新闻发言：公共传播三论》，《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第50页。

原因和处置的诸多疑问。在回答“车体为何掩埋”的问题时，王勇平的一句“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引发公众不满。此外，王勇平的发言更是遭到了诸多网友的嘲讽和揶揄，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我反正信了”甚至被列入2011年度的流行语录，如“凤姐最后的告白，反正我是信了”“奥巴马是中国人，我反正信了”等，看似搞笑、无厘头，实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权威的不信任。

古希腊的修辞学者认为，一个演说者只知道说什么是不够的，还须知道该怎么说。在演说中，不管我们要对别人说些什么，用事实来说明无疑是正确的，其中，语言表达的技巧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技巧可以有词汇、音韵、辞格等多方面的综合运用。合格的新闻发言人都需要有在政府和媒体长期工作的经验，并接受新闻传播学、心理学、语言修辞学、法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公关危机。

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将使政府、公众、媒体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对于我国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部门的信息传播者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社会里政府信息传播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危机发生时政府新闻发言的重要性。这是政府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一种方式。

四、结语

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发展形势，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加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是解决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诸多问题的重要举措，其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源作用，实现新旧媒体的优势互补，引导舆论走向以及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较处理好突发事件的关键所在。

内忧外患中近代中国佛教的新变革

刘晓英

内容摘要：近代是中国历史最为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之一，外有诸列强图谋瓜分，内有清政府丧权辱国。内穷外辱，激起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变法图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近代佛教也响应时代的要求，出现了一股爱国干世、变革维新的潮流。本文对近代诗僧敬安的爱国护教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内伤法弱、外忧国危、心系黎民构成了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脉络；他更以具体的行迹，如兴教办学、舍身御敌等践行了爱国、护教、新民的追求。以敬安为代表的爱国思想在近现代佛教界影响深远，也是中华佛教的优秀精神遗产。

关键词：近代 中国佛教 敬安 爱国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内忧外患之中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当日的中国，外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挟坚甲利兵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清政府一次次地战败求和，一次次地割地赔款，对于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亡国灭种之痛。满清王朝内部则是弊政丛生，封建集权，官浮于事，贪污腐败，民生凋敝……整个王朝已脱离于世界现代文明体系之外，国力日益衰弱。

内穷和外辱，激荡起了一个时代有识之士的变法图强之心、之举。先有“戊戌六君子”的变法维新，后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这一时期变革图新的思潮此起彼伏，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不断涌现，有器物上

的，有制度上的，更有思想文化层面的。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近代思想家，由于处于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因而把注意多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传统文化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倾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总是同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宗教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①

近代佛教界亦不甘落后于时代，佛门中人同被家国之难，同感民族文化的衰微，亦同领时代之风骚，他们一方面不满于佛教内部的远离世情，不问世事的倾向；一方面着手于佛教的与时同进，变革求新，使得近代佛教的面貌为之一新，出现了佛教历史上少有的中兴局面。概而言之，近代佛教的新变革，其突出特色就是紧贴时代的精神律动，走出山门，积极干世，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兴办教育，开启民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富强上呼下吁。

中国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素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慈悲救世之心和伟大的爱国情怀，无论在历史和现代，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优秀文化的形成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塑造中国的民族精神有过巨大贡献。本文即是以近代佛教为切入点，发掘和研究宗教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宗教教义及其历史实践中的积极因素，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圆融、相适应，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救亡图存的强烈爱国情结

佛教虽然以出离世情、逃离世间苦海为人生解脱的最终旨归，但爱国护教、庄严国土一直是大乘佛教最基本的精神，也是中华佛教优秀的精神遗产。释迦祖师生前传教，将“知恩报恩”作为佛弟子必尽的义务以及大乘菩萨道的重要内容，“世间之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二“报恩品”）其中“国王恩”虽是针对尔时封建王朝的君主而言，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在佛教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精神内涵早已演化为

^① 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解，这已成为佛教界普遍的共识。历史上众多的高僧大德遵循佛祖教诫，重视报答国恩，佛门中涌现出不少的爱国名人，他们的事迹至今让人钦佩感念。从舍身求法、扬国威于域外的法显、玄奘、义净，到近代投身革命的宗仰和尚、奔走南洋鼓动抗日救国的太虚法师、抗日战争中的僧伽救护队以及“念佛不忘救国”的弘一，佛弟子赤心爱国者不计其数，爱国爱民蔚成风气。^①

特别是近代以降，国破家亡的民族危亡感弥漫在大多数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心头，国向何处去？教往何处行？成为佛教内外众多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无可排解的忧患情结，佛教“由来世往生、极乐净土为终极追求的外在超越和即心是佛的内在超越，一变而为直面惨淡人生和对现实世界的终极关怀……以及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②。敬安即是近代爱国僧人中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生始终以“我虽学佛未忘世”^③、“学佛未敢忘忧国”自勉，以入世的精神，做着出世的事业，他的思想实践，既带有所处时代知识分子的共性，但身为佛门中人，又代表了近代佛教由山林佛教的避世倾向向世俗佛教的积极入世主张的转变。

敬安，号寄禅。早年一心向佛，不太关心世事，他早期的诗作“结庐人境外，终日掩柴关”（《住山岭》）、“禅心自清静，世事付苍冥”（《题笠公禅房》）、“平生甘淡泊，守拙安林泉”（《安贫吟》）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鄙夷，以及对守拙安贫、超然物外的彼岸生活的向往。直到45岁，他一直过着“一瓶一体一诗囊，十里荷花两袖香”（《暑月访龙潭山寄禅上人》）、“静坐不知天已暮，归来明月满诗囊”（《皋亭晚坐》）这样一种孤芳自赏、与世无争、潜心修行的生活。

然而，敬安生活的时代，中国已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禅床，法弱、国危、民贫、世乱，这些家国之痛时时搅扰着槛外人平静的修行生活。作为佛门中人，敬安从未真正离开红尘此岸，修到“心如枯木死灰冷”（《答天童献纯上人》），秉着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的教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从未平静过。面对西方强虏侵我国土、占

① 佛日：《佛弟子必爱国论》，<http://www.douban.com/topic/7893195/2009-09-04>。

② 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释敬安：《八指头陀诗文集》，湖南：岳麓书社，2007年版。